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Ren Zhongyi,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smiling. The portrait is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that looks like a map of China with a torn paper effect.

# 任仲夷

口述

## 广东改革开放最初历程

策划 本刊记者 肖耀堂 刘傅海 林文强

特约撰稿 关山 卢荻 统筹 本刊记者 吴明良

【编者按】本文是关山、卢荻同志 1999 年至 2005 年 8 月间多次访问任仲夷同志的录音整理稿，成文后曾经任老亲自修改审定，有部分重要章节系本刊独家发表。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之际，广东又一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我们经两位作者同意特别推出本文，纪念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大仁、大智、大勇的逝者任仲夷。任仲夷是一位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省委书记，在这位思想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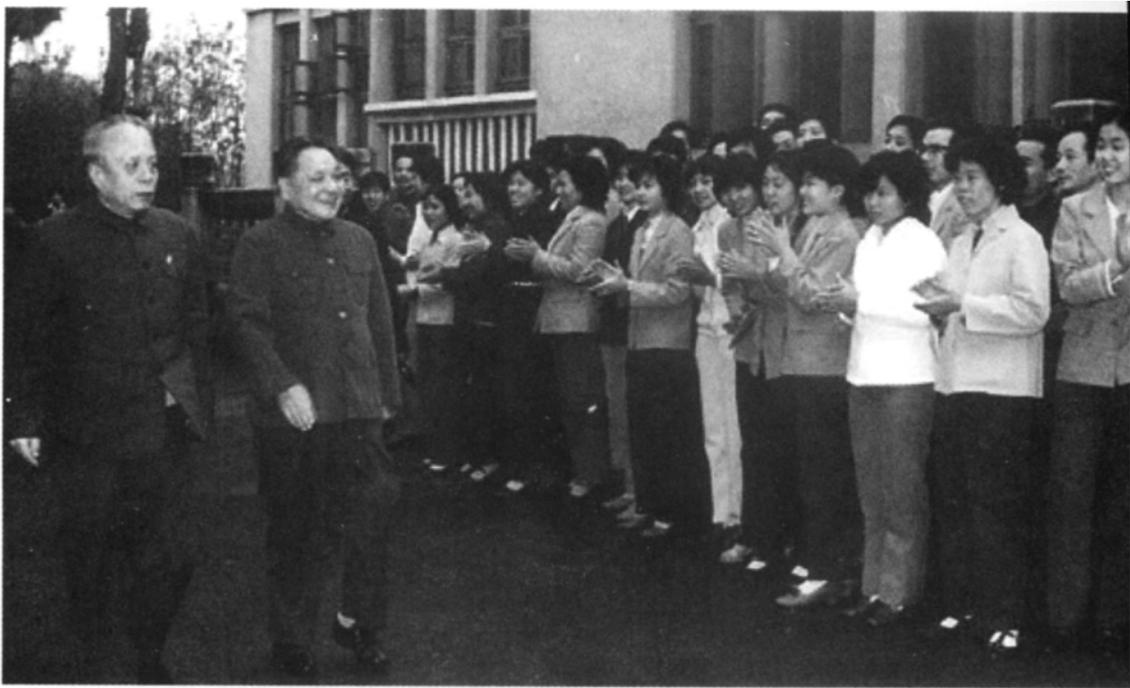
叱咤风云的改革先锋身上，有我们不应遗忘的勇气和智慧。

任仲夷主政广东的日子，正是广东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候。他刚上任不久，就碰上了全国的治理整顿（1981年）。当时中央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任仲夷从当时广东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顶住了这与小平同志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做法，不但不“缓改革”、“舍发展”，而是“冒死挺进”。他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的问题，勇闯物价关，加速发展，这才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另一次最能体现任老勇气的则是1982年，中央召开“两省会议”，专门研究广东、福建问题。面对当时广东个别地方出现的走私贩私问题，有人借题发挥，小题大做，以偏概全，上纲上线，横加指责，说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甚至说“特区变了颜色，成了租界”，连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迫于压力作了检讨。有人趁机想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又是任仲夷，冒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坚决顶住。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即使“二进宫”（两次被招进京检讨）也义无反顾。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任仲夷出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念百姓生活之维艰，负改革之重托，在关系改革开放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担当，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坚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顶住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保住了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保护了广东大批敢闯敢冒的干部，保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势头。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广东退一步，全国就退一百步！

现在，广东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一个更难超越的关口。在这个社会层面逐渐拉大，贫富日益悬殊的时代，我们不应遗忘任仲夷的勇气和智慧。一方面，我们的领导者要有世界眼光，对中国的未来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定地引领人民奔向文明的彼岸；另一方面，我们公民也要理解执政党的选择，与之达成默契。要明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只要我们上下同心，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学会民主，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就一定会共赢，广东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南方都市报》供图）

## 小平点燃思想解放之火

关山：任老，您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山：您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仲夷：是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1978年6月2日）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火车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山：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非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仲夷：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山：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卢荻：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听说他曾继在广州、成都之后点了第三把火。

任仲夷：是的。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

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他）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 中央挑选我执掌南大门

关山：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

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卢荻：你来广东上任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你和梁灵光同志，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仲夷：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先后接见了我们，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



》1982年6月,任仲夷(左一)在深圳蛇口听取袁庚(中蹲者)关于蛇口发展规划的汇报。(《南方都市报》供图)

》1980年11月,任仲夷(站立者)在广东省府礼堂与省市干部见面,表示将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贯彻中央特殊政策。(梁伯权 摄)

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叶帅紧紧握住我和灵光同志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我明白叶帅这一番话的含义。(上世纪)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紧接着,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的是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的裸

体画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广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1000元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后来,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

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灵光同志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关山：您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仲夷：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

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 坚持“先行”抵制“缓改革”

关山：您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您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仲夷：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在会上，一位中央领导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

“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卢荻：你第一次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什么时候？

任仲夷：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灵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

卢荻：这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发现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重大举措？



» 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南方都市报》供图)



» 2000年11月1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陪同下,在深圳与任仲夷亲切交谈。  
(《南方都市报》供图)

任仲夷: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我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做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觉得,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同志商量,决定马上对深圳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同志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来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卢荻:特区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们是怎样应对的?

任仲夷:当时不少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有人说,“特区不就是过去的租界吗?”甚至有的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12月16日-25日)。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我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

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我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亲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回来。

我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可以解除顾虑和担心。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参加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情况。

任仲夷: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我、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国务院、福建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年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改革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



》 2001年两会期间任仲夷（中）与李长春（右）在一起亲切交谈。  
（《南方都市报》供图）

》 任仲夷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交谈。  
（《南方都市报》供图）

仲。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他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27号文件）。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经我们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

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本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卢荻：1981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结束了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访问后，乘专机回到广州，你曾陪同他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听说你们曾经议论过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任仲夷：8月13日那天，我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陪同赵紫阳登山远眺，赵紫阳和我肯定了深圳建设要采取开发公司的方式，也就是蛇口方式。并明确指出政企要分开。“官”商要分开，特区的一切企业，都要独立经营，照章纳税。对于企业内部的事务，政府不要去管。赵紫阳问袁庚：“你在这里，有没有人问你姓‘社’姓‘资’问题？”袁庚实话实说：“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非难，没有人问我‘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著名理论家这样对我说过，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都这样那还行吗？”赵紫阳又转而问我：“我在北京，老是有人问我经济特区究竟姓‘社’姓‘资’，我也老是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你说说看。”

其实在我的脑子里,从到广东任职之日起,就不断思考着这一问题,并且翻阅了大量“老祖宗”的经典著作,寻找答案。我说:依我看,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赵紫阳点了点头,说:“我赞成这一看法。”

经广东省委和我的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受副省级待遇。

关山:您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仲夷:1982年初(1月18日晚乘专列到广东度假,20日抵达广州,2月9日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

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谈‘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山: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仲夷: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 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

卢荻: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仲夷: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这对广东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不久,便接到中央通知,广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18人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在省委负责人去京开会期间,分别由吴冷西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王全国主持省政府工作。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情况。

任仲夷: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

任仲夷（右四）在吴南生（右二）、林若（左三）陪同下参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左一为时任中共广东省副书记蔡东士。右一为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范以锦。右三为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杨兴锋。（《南方都市报》供图）



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

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山：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仲夷：（笑）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

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二进宫”本是京剧的一个剧目，一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剧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被认为是两次都挨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关山：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仲夷：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阅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

关山：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你是怎样传达的？

任仲夷：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

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都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同时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卢荻：1983年2月，你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对特区有何评价？

任仲夷：耀邦总书记是个思想很解放的领导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同志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小平

关 山：我接触过不少老同志，他们都讲，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

任仲夷：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工作，还要提习仲勋、杨尚昆等老同志，他们开了好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是1980年才来的，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只有4年多，贡献是不多的。1985年我就离休了。以后的每一届省委都干得很好，都使广东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有新的跃进。

关 山：以你的亲身经历，小平同志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任仲夷：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自从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

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还能背诵出来。不像某些做领导的，总是爱讲空话、官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话，讲了一大堆，人们还是不知所云，甚至连自己还未弄懂的问题，却夸夸其谈地教训别人。

关 山：您怎样评价邓小平的一生？

任仲夷：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

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不相适应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任仲夷(右)和本文作者关山(左)在一起。(关山供图)

## 政治改革需要勇气“杀出一条血路来”

关山：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虽然像你所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大有作为的处女地，但毕竟是“地雷阵”，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任仲夷：这一关始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

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

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人心思变。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当初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会得到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关山：在中国，政治改革勇气是需要的，但也要讲策略，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

任仲夷：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采访时是2004年——编者注），老啦，谈不出什么高见，浅见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

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我认为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关山：广东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仲夷：我看可以。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国务院就明文把广东、福建定为“综合试验省”，深圳定为经济特区，赋予先走一步的任务。这个文件直到现在并未收回和撤销。江泽民也曾希望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怎样增创新优势？增创什么新优势？我看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关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你有什么看法？

任仲夷：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上世纪）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

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的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关山: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任仲夷: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的提法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这说明他们管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成熟的经验。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关山:可是我们干什么都强调“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连市场经济也要搞中国特色的,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任仲夷:中国的东西自然会打上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烙印,不用强调都会这样。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特色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落后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少越好。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这次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很说明问题。我看就是上面讲的中国特色在作怪。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和丑陋的。

关山:改革的闯将,原深圳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曾提出:“三权分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主张中国应该

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又明确说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任仲夷:邓小平是坚决反对搞“两个凡是”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完全赞同袁庚的观点。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过去我们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一套教训还不深刻吗?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与坚持共产党领导并不矛盾,怕什么?

现在,像袁庚这样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于创新的实干家再多一些就好了。

关山:说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就是透明和公开。我今年初(2004年——编者注)去了一趟北欧考察,感触良多。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你不但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一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一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如果中国也这样做,想腐败都难。

任仲夷: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不难办到。现在电脑已经很普及,每个单位都有,上网就是了。这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利党利国利民,说不准每年1000多亿的公款吃喝费可以省下大半。

关山:任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任仲夷: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作者

关山:原名关飞进,男,1963年生,祖籍广东阳江。1984年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物理系,理学学士;1990年研究生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哲学硕士。1984-1990年在广东省阳江市当物理教师,1990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现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调研员。近10年来,其采写的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改革开放风云人物的访谈和系列评论引起了国内外传媒的关注。

卢荻:1945年12月生,广东郁南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和历史研究工作,参与撰写了《刘田夫回忆录》、《梁灵光回忆录》、《古大存沉冤录》等,专著有《范仲淹评传》、《叶剑英在广东的实践与理论》、《习仲勋传》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在撤出北平前夕合影。（资料照片）



》生活中的任老。（《南方都市报》供图）



》2005年8月10日任仲夷和夫人在少年叶挺的铜像前。任老幽默地“问”道“读什么书啊？”（吴粤摄）



》1997年9月13日，任仲夷在北京出席中共十五大。（《南方都市报》供图）

## 任仲夷年表

191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威县。

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文革”中受迫害，下放农村劳动。

1972年6月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3月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8年，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

1979年，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任仲夷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80年10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针对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他审时度势，从当时广东的实际出发，不但“缓改革”、“舍发展”，而是“冒死挺进”，善于“变通”，这才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2年，果断提出了坚持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主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又创造性地提出“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

1985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仍不遗余力地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想法。

1992年10月，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

### 鸣谢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南都周刊》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

关山先生  
卢荻先生  
许庆亮先生  
王景春先生  
梁音先生

## 任仲夷妙语录

不要事事“一慢、二看、三通过”

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三不原则”

我有一个自己的“三不原则”：第一，不出文集；第二，不写回忆录；第三，不写自传。如果别人要去写，我无权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是，我只是希望一定要实事求是，朴实无华。

“近水楼台”与“长袖善舞”

1982年1月19日，任仲夷在广东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应积极引进港澳和国外的资金与先进技术时说：“我们既要注意吸引港澳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又不要局限于港澳。对日本和欧美等都要加强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引进港澳资金和技术，广东是‘近水楼台’；引进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我们要学会‘长袖善舞’。”

“见怪不怪”与“少见多怪”

任仲夷有一次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过去有人说，广东对外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讲，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感觉“父母官”、“老板”刺耳

我对“老板”、“父母官”的称呼感到很刺耳。从概念上讲，“人民的儿子”与“人民的父母官”，“勤务员”与“老板”，这些称谓实在是极为矛盾的，互不相容。老百姓称我们干部是“官”，是“老板”，我们干部也把自己当成是“官”，是“老板”，不以为非，反以为是。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而是浓厚的封建意识在当前市场经济开始发育的变动时期沉渣泛起的一种表现。

不要埋怨人走“茶”凉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官”字看得过重，这种现象

不好。现在我们在干部制度上取消了终身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至今仍有些干部不适应这个新制度。有些领导干部退下来以后常有失落感，有的甚至哀叹“人走茶凉”。我认为，还应当是我曾说过的那句话：“但愿客来水热，莫道人走茶凉。”对退下来的人来说，人走了，“茶”自然要凉嘛。不要埋怨，想开一些，谁当领导干部都会有退下来的那么一天，今天是别人，明天就会轮到你了。不在位，自然不谋其政，“茶”当然不会老热着，这是正常的。退下来的人要生活得积极乐观，遇事泰然处之。

“浑身是胆”和“无所畏惧”

任仲夷同志九十高龄的时候，虽然身体已不如前，但头脑活跃如故，思维超前如故，幽默乐观如故。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一目了然了；一只耳朵已失聪——偏听不偏信了；一个胃已经切除一半，无所谓（胃）了；一个胆也已摘除，变得浑身是胆了。”1993年，动手术切除了百分之八十的胃，但他幽默不减，自谓从此“无所畏惧”。这种对生命的乐观态度，真是少见。他还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见马克思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做到了无愧无悔。我这一辈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可以无愧无悔地去见马克思了，我估计马克思也会面带微笑接见我。”

“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

谈到任老的名言“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时，他说，我说的“凡事”，是指一切事物，特别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顺其自然，就是要顺应客观规律去办事。人到老年，更不要把名利、财物看得太重。这既有利于保持晚节，也有利于身心健康。当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途中住在农户家，在和一位老太婆交谈中，那位老太婆对西太后说：人都是光着腚来，光着腚走的。意思是荣华富贵、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生未带来，死也带不走。一个人生活淡泊也要处之泰然。

“我不怕死，但我还想多活几年……”

2004年9月，任仲夷最后一次住院，广东省委原常委杜瑞芝前往探望，安慰他说，年龄大了，就不要再过问太多事。任仲夷则回答：“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在这次住院期间，确诊任老得了肺癌。他坦然对医生和家人说：“我不怕死，但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我们国家的变化，看国家更加进步，看人民更加富裕，看政治更加民主，看社会更加和谐，你们就大胆地治疗吧！”

# 他人眼中的任仲夷

任仲夷不仅是一位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干部。他家里珍藏着一幅“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照片（据说当年他挨过1000多场批斗），将之称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定要牢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重犯“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他不断地提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

讲述者李锐：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中共党史专家。

初到广东时，有人反映当时流行于广东的“音乐茶座”有问题，说那音乐软绵绵的，削弱革命斗志。仲夷说，既然群众喜欢，又不违法，领导人何必干预。还有人反映，一些年轻人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应予禁止。仲夷却认为，这不过是个人生活爱好，党和政府不必管。那个时候听省委书记说这样的话，人们觉得既惊讶又受启发。当时还有人流行歌曲很反感，要求制止其传播。仲夷说，我个人也听不惯流行歌曲，而更喜欢古典音乐。但领导人不能仅仅根据个人喜恶制定政策，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

讲述者张岳琦：历任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政协主席等职。

广东兴办经济特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许多新事物。对这些新事物，一时非议颇多，甚至认为广东已经在实行资本主义了。仲夷同志既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又反复强调两个坚定不移。既要坚定不移地打击经济犯罪，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对各地干部更多的是鼓励，在思想上给同志们鼓劲，要“排污不排外”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我当时还在湛江工作，在地方工作还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后来到省里工作了，才发现解放思想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在思想上解放了，才能轻松上阵，才能放开手脚去开展工作，广东的改革开放才能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讲述者林若：原广东省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现任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仲夷同志从1980年11月调到广东工作，在广东整整25年。他是我们那一时期省委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广东人民非常敬重的老同志。我和仲夷同志相处25年，又是日夕聚晤的邻居。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他在家，天气好，他早晚都会到杨柳低垂的湖边小道上散步。经过我家门口时，我常常结伴同行，倾心交谈。我们也深深知道“岁月不居”的道理。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但仲夷同志晚年最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湖边漫步时，多少次谈到，“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但只有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讲述者吴南生：原中共广东省委调研室主任、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任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党的十五大召开，任仲夷同志以80多岁高龄当选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当他离开人民日报社时，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江绍高同志说了一句：“祝任老健康长寿！”不料任仲夷同志突然停止脚步，正色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好！”大家都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凡是被人说健康长寿的，都说明他快要‘差不多’了。哪有对少先队员说‘健康长寿’的呀？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嘛！”说罢，他立正举手行了个少先队礼。确实，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同志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

讲述者范敬宜：原文化部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

任仲夷刚到广州不久，就提出要去看看民主党派。当时，民主党派的办公条件普遍比较差。某个党派甚至只有一间办公室，在下班时，只有将电话放到隔壁的厕所里，以让值班员接听。任老看到后很有感慨，但还是很幽默地安慰他们说：“你们比资本主义国家都先进了，卫生间里都有电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任仲夷在

视察之后还是谈起了实际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此话一出，众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们心头一凉。不过，他话锋一转：“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出个主意，向分管财政的副省长杨德元汇报情况，并且告诉他，任仲夷建议他来现场看看！”事后，杨德元果真去现场看了，民主党派反映的实际困难基本上也都随之解决了。

讲述者 璩立铭：1982年起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秘书。

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对竖起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争论不休。顺德除了规定县委机关不收看外，对广大干部群众并没有硬性禁止收看。对此，仲夷同志以长者对晚辈促膝谈心的态度问我：“人民群众只看香港电视，不看内地电视，能知道国家大事吗？”我无言对答。他和我一起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最后，任老给我一个原则：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拆鱼骨天线会适得其反，行不通；既要老百姓坚持收看内地电视，又不一概否定香港电视，排污不排除。任老的意见令我心服口服。顺德遵从任老的指示，决定从技术上发展公共天线，采取“以我为主调控、有效取代鱼骨天线”的方针，结果是顺从了民意，也保证了安全和改善了市容。

讲述者 黎子流：原广州市市长，曾任广东省特区办主任。1998年正式退休。

退居二线和离开工作岗位这20年间，仲夷同志和我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我俩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河边散步聊天。仲夷同志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仲夷同志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记得2004年2月10日，我的老秘书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我让仲夷同志审阅。大约个把钟头，仲夷同志就退回来了，他在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写的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仲夷同志对敢说真话的人最尊重，对口是心非的人最反感。

讲述者 杜瑞芝：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顾委副主任。

任老不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对家人、亲属要求也极严格。任老在广东工作二十几年，但从来没有安排过一个亲属在广东工作过，他的亲弟弟任兰田大

叔甚至连广东都没有来过一趟！2003年8月，我随任老回辽宁，任老抽空去了趟弟弟家。任老的弟弟是位农技师，当时已退休，住在辽宁盖州县熊岳镇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宿舍，一家四世同堂挤在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我们到了后，大家坐在那里连转身都觉得困难。任老曾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但我看着兰田大叔的家况后心想：看来这位弟弟并没沾上哥哥的一点光。任老的弟弟很了解哥哥“六亲不认”的脾性，从不找任老办事。

讲述者 潘东生：曾在广东省委办公厅第二秘书处、省委办公厅会务处、省委办公厅工作，现中共佛山市高明区委常委、副区长。

任老重情谊，广私交，他的朋友中不仅有官员，还有作家、画家、教授、编辑。他们经常见面聚会，电话问候，登门作客。他给大家带来一堂笑语。他家更是高朋满座，笑声阵阵。进入他简朴的客厅，总是感觉温馨快乐，不觉时光的流逝。一次胡冀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先生秘书）看到任老夫人王玄大姐年轻时的照片，惊讶地说：“好靓啊。”任老说：“我也好帅嘛。”大家哈哈大笑。看到“卢沟桥事变”后，临撤出北平前夕任老伉俪的合影，见他西装笔挺，一手搭肩亲热地站在夫人的身边，颜容秀美，一表人才，才知他说的完全是真话。他俩不只是有共同理想的革命情侣，还是靓女帅哥天生一对。

讲述者 高伟梧：原广东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编辑。

我熟悉任老近50年了，无论他在黑龙江省担任副书记还是在辽宁省当省委书记，特别是在广东担当第一书记，兼任广东军区第一政委，他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尤其任老对我在开拓蚂蚁疗法最艰难的时刻，他助了我一臂之力。1981年，我在黑龙江桦南蚂蚁研究所担任技术顾问，主持首创研制成蚂蚁补酒，省外贸公司建议把产品送到广交会展示能出口创汇。我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老写信汇报。不久，他让秘书打电话欢迎我参加广交会，到广州直接到省委找他。我和科委、外贸的两位同志一同乘机到广东省委，任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鼓励我们说：“蚁酒能出口是黑龙江的荣誉并能创汇是件大好事。”1998年，我主持用蚂蚁研制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国家级新药——“玄七通痹胶囊”问世的新闻在国内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后，84岁高龄的任老还打来电话祝贺。2002年研究成功蚂蚁治疗乙肝的新药——复方蚂蚁养肝胶囊，任老再次来电祝贺。

讲述者 吴志成：当代蚂蚁疗法的开拓者和倡导者，被誉为中国的“蚂蚁王”。